

· 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 ·

英国的“寒门贵子”研究

——以霍加特“奖学金男孩”为考察中心

李 丽

(杭州师范大学 经亨颐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对于如何在“寒门贵子”个体的升迁与其阶层群体的社会流动之间建立联系,英国理查德·霍加特的“奖学金男孩”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域外的参照。在阶层旅行的过程中,“奖学金男孩”在文化上失去了平衡,在阶级归属上遭到了双重流放,成为“浮游无根”的一代。霍加特希望通过改变既有教育模式和标准,将“奖学金男孩”培养成具有阶级使命的“热忱的少数人”,并进一步启迪和教育大众,从而推进社会的民主与平等。霍加特的“奖学金男孩”研究,在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价值逻辑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与我国的底层文化资本理论既有呼应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能够为我国的“寒门贵子”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奖学金男孩”; 底层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22)07-0099-11

Rethinking “the Elites with Poor and Humble Families” in England: A Study Center on Richard Hoggart’s “Scholarship Boys”

LI Li

(Jing Hengyi School of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How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omotion of an individual with a poor family and the social mobility of the class groups? Richard Hoggart’s “scholarship boys” study provides us with a comparison of exotic experiences. In the process of class travel, scholarship boys lost their cultural balance, suffered double exile in class belonging, and became a generation uprooted by education. Hoggart would like to promote the democratization of education by changing the existing education models and standards, and cultivate scholarship boys into “earnest minority” with class missions, and enlighten and educate the public, thereby promoting social democracy and equality. Hoggart’s “scholarship boys” study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value orientation. It has echoes and differences with the domestic “underclass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which could provide a certain enlightenment for the study.

Key words: “scholarship boy”; underclass cultural capital

收稿日期: 2022-05-15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2NDQN268YB)

作者简介: 李 丽(1990—),女,湖南冷水江人,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外国教育史研究。

一、从“寒门贵子”问题谈起

近年来,“寒门贵子”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和学术界广泛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从2011至2022年,每年都有相关学术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总体而言,国内已有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聚焦于“寒门为何难以出贵子”,试图从宏观社会背景及制度层面来探讨教育与阶层固化的关系,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与对策^①;一类聚焦于“寒门如何出贵子”,重在从“寒门贵子”群体本身的人生经历出发,关注底层子弟如何实现阶层突破^②。这些研究各具特色,但从总体上而言,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受布迪厄(P. Bourdieu)有关文化资本理论的影响,或者正向认为底层学子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是因为缺乏相关的文化资本,或者反向思考,认为底层学子拥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本,并因此帮助他们实现了阶层旅行。这两类研究似乎都容易陷入一种理论困境:前者认可了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精英主义”,即“文化资本”中的文化指的是被既有社会和文化秩序认可的高雅文化,而底层学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的家庭不具备中上阶层的高雅文化资本,因而他们无法实现阶层流动,只能子承父业,这其中还隐含着悲观主义的陷阱;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提出了批评,试图以动态的方式看待文化资本,认为底层学子拥有特殊的“文化资本”,并将其视为底层子弟获得教育成就和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文化基础。相对于前一类研究,后一类研究更加注重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同时有着“寒门能出贵子”、底层子弟能够突破阶层束缚的乐观想象,并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在宏观社会背景与微观个体经验之间建立联系。但对于如何在“寒门贵子”个体的升迁与其阶层群体的社会流动之间建立联系,这两类研究都没有给出答案。

对此,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霍加特(R. Hoggart)的“奖学金男孩”(scholarship boys)研究,能够给予我们很好的启发。1957年,霍加特出版了《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一书^③,其中就对英国的“寒门贵子”现象进行了分析。霍加特结合自己的生活教育经验,研究了一类被他称为“奖学金男孩”的群体。这一群体出身社会底层,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并改变命运,实现了阶层突破,是“寒门出贵子”的一种典型代表。霍加特参照自己的经验,将研究焦点投向研究对象自身的文化失衡,并探讨了教育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因而使得

其“奖学金男孩”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本文通过分析和梳理霍加特“奖学金男孩”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特色,并将其与近期国内学界有关“寒门贵子”研究的底层文化资本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中国“寒门贵子”教育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霍加特的“奖学金男孩”研究

二战后,英国政府致力于“福利国家”建设,在国民保险、个人社会福利和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英国人在物质生活水平上有了显著提高,工人阶级首次开始拥有同中产阶级一样的生活物品,“富裕社会”和“无阶级”(classlessness)神话开始在英国蔓延。^④随着1944年《巴特勒教育法》(Butler's Education Act)和1963年《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的出台^⑤,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子弟进入正规教育体系,依靠政府奖学金资助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奖学金男孩”。随着教育机会的扩展,“奖学金男孩”能够通过个体努力而实现阶层突破。但是,这种支持个体向上流动的观念却在工人阶级共同体内部造成了分裂:个体通过教育实现了社会身份的提升,最终却脱离了其原属的阶级群体,阶级整体无法以群体的方式取得进步和发展。作为“奖学金男孩”的霍加特,敏锐地感觉到这一过程对工人阶级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他结合自身的经历,研究了“奖学金男孩”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教育在其中的作用。

1. 文化失衡:失去阶级归属的“奖学金男孩”

尽管霍加特是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明确地提出“奖学金男孩”的,但他在多处论述中以亲历者的身份描述了“奖学金男孩”的教育经历以及文化失衡。在其个人的自传回忆录中,霍加特讲述了自己成为“奖学金男孩”的历程以及对英国正规教育的感受。霍加特出生于英国利兹郡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8岁时成了孤儿,在汉斯莱特镇接受初等教育,这里的学校条件简陋,学生主要来自社会底层,教师水平不高。霍加特认为,对当地的学校师生来说,“最为缺乏的是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知识即是快乐、知识富于挑战且挑战现有知识之认识”,“他们也缺乏对复杂的社会变迁的深入思考,例如工人阶级对社会压力、受教育机会等的深刻认识”,“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灌输式的,缺乏参与性的、激发思考和讨论的东西”。^[1]不过与大多数同他出身背景相似的孩子相比,霍加特无疑是幸运的,在11岁那年,霍加特在校长的推荐下进入了利兹郡一所文法学校就读。

然而,这种幸运也同时给霍加特带来了不幸。由于学校环境与成长环境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霍加特进入文法中学后,用了两年时间才适应这个充满竞争的环境。这一时期,他一度感到精神崩溃,甚至被家人送去疗养院休养。在疗养期间,他从阅读中“找到了一条出路,一种精神支撑”。从那以后,霍加特常常独自去公立图书馆进行阅读,并逐渐受到英国文学家哈代的启发,开始反思英国社会的文化问题。霍加特在回忆时说,通过阅读,“我平生第一次试着去思考‘文化’(culture)和‘文明’(cultivation)的区别,而我一度混淆了它们”,“我第一次强烈地、有意识地认识到,我们应该挑战那些流行的教条”。^[2] 18岁那年,霍加特通过了利兹大学的考试,获得了奖学金,成为一名“奖学金男孩”。

进入利兹大学后,霍加特仍然感到自己始终处于“两种文化”的张力之间:他原来所属的文化(original culture)和知识赋予他的文化(intellectual equipment)形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3]在这种张力之中,“奖学金男孩”会被“引诱”成为端庄的、文明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很聪明或在某些方面得到认可的学生。可是,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种“引诱”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什么样的矛盾。从中产阶级的立场去观察,他们似乎或明确地假定或默认自己正在远离原来的背景,即使不是正面的拒绝,也是在悄悄地放弃它。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正确的。尽管如此,这些学生仍然感到自己的出身在很多方面牵住他们,即使无法描述那是什么,也没有人帮助他们去言说。“在我们的情感和理智之间存在鸿沟,那是令人痛苦的,如果我们的理智和情感想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弥合这一鸿沟。”^[4]

一些从原有阶级中脱离开来(declass)的“奖学金男孩”能够运用智力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暂时维持两种文化的平衡。他们从小就是别人心目中“很有头脑”(got brains)或“很聪明”(bright)的人,因此,在进入文法学校后,他们常常通过自己的“头脑”使自己取得更大的进步,而“聪明的头脑”就是他们换取人生道路的“通行货币”。事实证明,在“头脑—货币”(brain-currency)的市场中,这种货币的效用也越来越明显。^[5]所以,这些孩子们花大量的时间去刻苦学习,以获得升学和争取奖学金的机会。他们明白,只要适应并“顺从地接受”这些规则,就能获得其他人的肯定,而他们原先那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可以被宽容地对待。在这种环境中,“奖学金男孩”有着明确的方向和进步的动力,他们非常重视“考试和知识积累”,因为“长久性的考试能让他

在每一级阶梯上都获得赞扬和鼓励”。^[6] 尽管这类“奖学金男孩”很聪明,也很有头脑,但却很少拥有“自由奔放的心灵,像风筝一样大胆飞翔的精神,以及反对‘教条路线’的勇气”^[7],而这也是他们难以最终进入上层社会的主要因素。

这种短暂的平衡很快就随着“奖学金男孩”进入社会而打破。当他们走出校园,面对难以预料的世界时,他们才发现,原来,苹果棒棒糖并不总是奖赏给那些工作最努力的或是头脑最聪明的人,相反,人身上的那种无法精确衡量的气质或品性,比如“性格”、“纯粹的运气”、“融入圈子的能力”以及“勇气”等^[8],才是决定你是否成功的关键。而在“奖学金男孩”看来,这些令人“捉摸不定”的东西,是一种“无形的接受障碍”,是一种令人愤怒甚至憎恨的“社会排外主义”。^[9]此时,他们很快发现自己面临阶级身份认同的危机。一方面,尽管他们感受到来自中产阶级的歧视和偏见,却仍不得不有意模仿中产阶级“光彩照人的、富足的、冷静的且能随时讨论书刊内容”的那种从容和品质。^[10]这使得他们背负着“忘本”、“背叛”的道德枷锁,且因为其与自身的经验发生冲突而导致更严重的焦虑。^[11]与此同时,受原有阶级意识的影响,他们又对中产阶级持不信任甚至鄙视的态度,认为“他们”的世界充满虚伪、自满和空想,在内心深处并不愿意成为这一阶级的一员。另一方面,“他不能坦诚面对自己的工人阶级,……他有时会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他已学会‘看不起自己’,学着比工人阶级的许多行为方式更优越一些。他常常对那种能够清楚地透露出自己出身的外表感到不自在;当他意识到每天都有上百种言行习惯将自己‘出卖’时,他内心都会感到犹疑或者愤怒”。而在工人阶级群体看来,“奖学金男孩”已经成为“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他们能“在一英里远之处就嗅出他的味道”。^[12]因而尝试回归工人阶级的“奖学金男孩”也会因不合群而遭到嘲笑,感受到另一种歧视。这种尴尬处境使得“奖学金男孩”不属于任何阶级,甚至不属于所谓的宽泛意义上的“无阶级的知识阶层”(classless intelligentsia)。他们成了在精神和身份归属上“浮游无根”(the uprooted)^⑥的一代,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和迷失感伴随他们的一生。

2. 脱离阶级:通过教育“攀上阶梯”的一代

霍加特得出结论:“奖学金男孩”这一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被自己的天赋切断了与原属阶级之间的联系,而这一失去归属感的过程最有力的推动者则是英国的整个教育体系。霍加特的亲身经历揭示了当时英国教育制度存在的缺陷,即受教育机会的不公

以及已有教育对个体创造力和独立思想的扼杀。^⑦作为工人家庭出身的“奖学金男孩”，霍加特忧虑的并不仅仅是这一层面，他还反思了这群“焦虑的、失去精神归属感的人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失去平衡”和“不确定性”，进一步揭示了在既有文化和教育制度下，英国工人阶级在根基上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英国教育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子弟进入正规教育体系，成为“奖学金男孩”。尽管教育机会大大增加了，但霍加特认为英国正规教育中的阶级偏见仍然没有消失。“不管是在社会交往层面，还是在教育流动方面，我们并没有变得更加开放”，不同社会阶级出身与其未来发展机遇之间的关联，仍然十分牢固。正因为如此，霍加特才会说，在我们国家“并没有所谓的‘教育’制度，我们有的是‘教育—阶级’制度’，而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13]。在霍加特看来，虽然社会福利的增加对于工人阶级而言确实十分重要，但在这个福利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获益最多的、最充分占有和利用社会福利的，依然是中产以上的阶级。此外，霍加特还批判了“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价值观：一方面，它将资产阶级的观念包装成价值中立的课程，传递给了工人阶级子弟；另一方面，它裹挟着极端职业主义的价值观，随着工业和商业赞助广泛地进入学校，学校成为公司文化和资本逻辑影响及收编的对象。^[14]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以批量生产为特征的商业化大众文化的流行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同样裹挟着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流行音乐、报纸杂志、通俗小说、电视节目等不断影响工人阶级子弟，使得他们深陷在物质进步和文化迷失之间的鸿沟中。霍加特指出，流行出版物作为一种所谓的“无阶级”的文化商品影响着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使得不同阶层的人在文化取向上逐渐被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整合为消费“大众”。工人阶级在大众文化的“糖衣世界”里逐渐丧失了自身原有文化形态中的积极因素，批判力的丧失使他们对“无阶级文化”论调背后隐藏的文化压迫毫无察觉，从而面临被商业机器、意识形态所左右的危机。^[15]所有这些现象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现实：工人阶级的根基，在既有教育体系和新兴大众文化的整合和规训下被逐渐抽空，曾经稳固的工人阶级意识和共同文化开始走向分裂。

对于工人阶级子弟而言，正规教育体系所传递的是中产阶级的文化和价值观。这种文化和价值观使“奖学金男孩”的思维模式化、同一化，从而与其自身阶级文化疏离，并对阶级的历史经验茫然无知。霍加特指出，英国既有教育体系所传递的是一种“阶

梯”(ladder)观念，它所灌输的是“向上爬”的竞争意识。当“奖学金男孩”通过正规教育体系从所属阶级中“逃离”之后，又难以在充满竞争和排斥的社会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因此，他们在文化上出现了失衡。他们在通过个人奋斗从工人阶级跻身更高社会阶层的同时，却被整齐划一、实用主义的教育模式剥夺了创造力和批判力，从而在商业化的大众文化之中迷失了自我：与自己原有文化的疏离和消极的犬儒主义态度，使他们缺乏改变现状的行动能力；对个体上升的诉求取代了集体主义精神，又使他们缺乏将个体发展与原属阶级的整体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动力。这样的教育使得曾经团结一体的工人阶级逐渐走向分裂。^[16]

这种观点得到了霍加特同时代学者的认同。同样是文化研究奠基人之一的威廉斯(R. Williams)也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一种“阶梯”观念，这种观念强调的是个人机会的获得，而不是阶层群体的上升：“你爬阶梯时，只能独自一个人往上爬”，“许多人的确都爬上去了，成了另一边的人；许多人试着往上爬，但是失败了”。威廉斯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因为“阶梯”的意象本身就意味着这个社会 and 制度是具有等级性的。换言之，因为它有等级性，所以才需要用“阶梯”的方式，让一小部分人爬上来，但阶梯本身并不能改变社会的物质分配方式、文化分配方式和权力分配方式。甚至许多通过这种阶梯爬上来的工人阶级的领袖，都被它背后的观念迷惑了。“少数人被阶梯软化了，会讲出显然是其他人期望通过他的口讲出来的话”。因此，阶梯并不是在改变工人阶级的文化地位，甚至就它的迷惑性而言，它还会让工人阶级的团结观念受到损害。它既削弱了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的“共同改善”原则，同时也使得等级制度变成了“裹着蜜糖的毒药”。^[17]阶梯观念与中产阶级在教育中提倡的“强调顺从和尊重权威”的“奴仆训练”观念一起，对工人阶级传统的“团结观念”产生了侵蚀，从而维持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现状。

3. 回归阶级：从“有知识的少数人”到“热忱的少数人”

让霍加特感到忧虑的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子弟在受教育后只是被规训为关注个体升迁的“奖学金男孩”，而不是成为关注自己原属阶级普遍利益的、富于批判性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那么这种教育的后果就是不断抽空工人阶级的基础。如何让这些脱离阶级的少数知识分子即霍加特所称的“有知识的少数人”(intellectual minority)回归阶级？

霍加特给出的答案是培养“热忱的少数人”(earnest minority, 又译“真诚的少数人”、“真诚的少数派”), 让他们承担起帮助更多人觉醒和提高认识的使命。霍加特提醒我们特别注意, “‘真诚的少数人’非常重要”。^[18] 不过, 霍加特也坦承, 《识字的用途》这本书更主要的一个态度, 是“关注大多数人”: 他“并未过多提及‘热忱的少数人’在工人阶级民众中的影响”, 因为该书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工人阶级中“大多数人的各种态度”问题。霍加特这么处理, 并不是要有意“低估‘热忱的少数人’具有的影响力”, “也无意暗示这种少数人在今天不大能找到”。^[19]

霍加特敏锐地意识到, 关于工人阶级中的“有知识的少数人”的问题, 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话题”, 尤其是不能将其与“热忱的少数人”混为一谈。^[20] 前者拥有“聪明的头脑”, 具备“丰富的学识”; 后者除了受过良好的教育之外, 还具有“对社会目标的意识”, 换言之, “就他们作为‘工人阶级运动’的一部分而言, 他们还要直接参与社会活动”。^[21] 尽管如此, 霍加特强调, 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有知识的少数人”的力量, 不能把“有知识的少数人”和“热忱的少数人”割裂开来, 二者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仅仅怀有对社会的目标和热忱而缺乏知识和智慧, 将不能很好地为工人阶级民众在物质、文化地位上“带来显著的改善”。所以, 培养“有知识的少数人”尤为重要。

霍加特认为, “有知识的少数人”, 也就是像“奖学金男孩”一样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具有广博知识的人, 能够以知识为武器, 代表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的知识分子进行正面交锋, 从而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虽然“有知识的少数人”在通过教育的阶梯层层上升后, 有的会“被转化为其他阶级的成员”, 甚至“脱离者的比例相当大”, 但霍加特对此依然保持乐观。在他看来, “并不是所有人都脱离了自己的阶级”, “也不是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会在情感或身体上脱离自己的阶级”, 而且随着工人阶级文化的成熟和完善, 会有越来越多的“有知识的少数人”属于工人阶级, 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2] 因此, 霍加特认为, 最重要的是“奖学金男孩”能够重新认识社会现状, 能够将个体的发展与整个阶级的利益相结合。“热忱的少数人”之使命是通过思想上的启迪和教育作用, 将人们从物质享受和令人麻痹的大众文化中唤醒, 共同去建设一个真正民主、平等的社会。霍加特希望通过“少数人”的启迪与教育来提高工人阶级的感受能力和批判意识, 鼓励他们去追求更加充实和自主的生活, 这里涉及的是推进教育的民主化以及改变既有的教育模式, 在

新的大众文化时代重新定位教育的目标与标准。

但不管是“有知识的少数人”还是“热忱的少数人”, 都面临着被大众文化“吞噬”的危险。因为当时的大多数通俗出版物、电视节目等都“鼓励一种对待生活的颓废态度”^[23], 工人阶级很难透过娱乐化的生活去认识现实中的危机、不平等的状况。随着大众文化的流行和泛滥, 工人阶级也会被带入一种消沉、堕怠的幻象中。正如霍克海默(M. Horkheimer)所说: “文化工业不断地向消费者许诺, 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它许诺说要用情节和表演使人们快乐, 但这个承诺却从没有兑现; 实际上, 所有的诺言都不过是一种幻觉: 它能够确定的就是它永远不会达到这一点。”^[24] 而让霍加特更担心的是, 这种“较为琐屑的大众娱乐”不仅会影响工人阶级中的有知识的或热忱的“少数人”, 还会让那些没有知识禀赋的人更难让自己“变得聪明睿智”, 最终使“我们在文化上正在变得没有阶级”。^[25]

因此, 为了抵制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侵害, 霍加特倡导一种不同于既有学校流行的教育模式, 即那种培养适合国家经济需要的个体或精英主义的教育模式。^[26] 他尤其反对后一种教育模式, 认为它只会加剧社会的分层和不平等。一方面, 霍加特强调应该增加教育机会, 把高等教育更广泛地扩展到工人阶级。他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为维护工人阶级文化而提出的解决方案, 就是要推进教育的民主化。在他看来, 加强工人阶级的教育可以使他们在那些关涉自身的事情上“能够有, 并应该有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27] 他始终相信, 只有实现教育的民主化, 才能真正跨越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鸿沟, 使工人阶级不至于逐渐丧失自己的价值判断能力, 最终被中产阶级同化。^[28] 霍加特自己一生都在实践这个方案。另一方面, 霍加特所倡导的教育并非纯粹传递文化知识的教育, 而是培养“批判素养”(critical literacy)的教育。在文化研究者特纳(G. Turner)看来, “批判素养是霍加特从《识字的用途》到《两个世界之间》(Between the Two Worlds)等诸多著述中的中心议题”^[29]。同时, 霍加特本人也曾在《识字还不够》(Literacy Is Not Enough)一文中清晰地诠释了“批判素养”的含义: “这是一种具备批判性意识的素养, 它不随意拿来(take in), 这种素养能够‘读出’(read)存在于语气、选择、仅凭喜好而定的错误主张和其他东西中的欺骗性。”^[30] 因此, 霍加特所关注的并不是纯粹的“读写能力”, 而是以识字阅读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对文化现象感知、领会和批判的能力。此外, 他还十分关注

工人阶级运用这种能力的过程与结果。^[31] 培育和教化英国工人阶级的识字能力、阅读能力、创造性理解能力,以期提升他们对英国现实的批判能力,这是霍加特思考教育问题的重要主题和核心问题,也是霍加特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的本真诉求。^[32] 霍加特的这一教育追求,已不再是以多少人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为标志,而是以全体成人的文化水平作为标准,它已远远超出了正规学校教育体系的范围,这即是霍加特所称的“识字的用途”。

三、“奖学金男孩”之于阶层流动的文化研究尝试

在“奖学金男孩”研究中,霍加特通过拓展文化的含义,将文化从审美领域解放出来,成功定义了工人阶级文化,使得工人阶级拥有了自己的底层文化资本。在这个前提下,教育在霍加特的研究中成为一种文化实践形式,因而成为工人阶级底层文化资本的组成部分。

1. 重新定义“底层文化”

在英国,存在一个以阿诺德(M. Arnold)、艾略特(T.S. Eliot)和 F·R·利维斯(F.R. Leavis)等为代表的“文化—文明”传统。这一传统将文化定义为高雅文学和艺术,并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持文化的纯粹性,以此来对抗功利主义文明。依据这一文化定义,工人阶级这一底层群体是没有文化的。二战结束后,英国社会普遍流行着一种“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化了”的“无阶级”论调,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工人阶级在衣着、住房、闲暇时间甚至是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已经跟中产阶级无异了。因此,在物质财富已经难以作为阶级区分标志的背景下,对于左派知识分子而言,“挽救工人阶级文化是一场运动,这一运动是为了把这种文化及那些实践这种文化的人从 E.P. 汤普森所说的从‘后人极度恩赐的态度’中拯救出来,同时也是为了给这一阶级肯定自身价值——‘工人阶级的道德系统’——提供自信和力量,以此来对抗统治阶级的道德系统”^[33]。

在这样的背景下,霍加特试图打破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精英式的文化定义,将工人阶级的言说和行为方式纳入文化的含义。霍加特将文学研究的分析技能运用到了更广泛的大众文化产品,如音乐、报纸、杂志和流行小说等,从而证明了公共文化的各个方面同个体的日常生活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前者如酒吧、工人俱乐部、杂志和体育运动等,后者包括

家庭角色、性关系、语言风格、共同体的共识等等。^[34] 因此,霍加特的文化概念“意指工人阶级如何言说和思考,他们在谈话和行动中分享着有关生活的何种语言和一般性假设,怎样的社会态度提供了他们日常实践的信息,他们使用了什么道德范畴,从而对他们自身的行为作出评判——当然,这包括了他们如何把这一切运用到他们阅读什么、看什么和唱什么上去,即使只是格言式的”^[35]。这一定义强调文化的普通性,即普通人具有建构共享意义实践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能力;文化不仅是精神性的存在,它还是社会实践的构成部分。^[36]

霍加特的文化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文化的含义,他运用原本属于中产阶级主流话语的方式,阐述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合理性,接合了“工人阶级”和“文化”这两个本不相关的概念,使“工人阶级文化”进入当时的公共话语空间,从而建构了文化研究史上第一种替代性话语——工人阶级文化话语。^[37] 正如德沃金(D. Dworkin)所言,霍加特“重新创造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味觉、声音、嗅觉和情感”^[38]。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识字的用途》是一代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严肃、真诚而沉重的声音”,是对社会变迁、当前趋势的鲜活经验和感受,它对影响工人阶级生活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39] 霍加特的这一策略成功地定义了工人阶级的“底层文化”,将“奖学金男孩”内心的焦虑转换成了维护社会平等、促进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从而成功地将“奖学金男孩”的个体命运与工人阶级群体的命运结合起来。

2. 强调底层文化的能动性

后来重点关注教育制度的“文化再生产”功能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指出,看似中立的学校教育,其实是将社会主导阶级的文化专断内化于学生头脑之中的一种文化再生产过程。^[40] 霍加特笔下的“奖学金男孩”通过接受教育而脱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布迪厄的理论。但与布迪厄相比,《识字的用途》暗含了一种主张:工人阶级受众并非中产阶级教育与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任意加以书写的白板,可以随意灌输知识的容器,他们有其自身的“文化”,这种文化与有教养阶层的文化一样复杂和缜密。在这个前提下,学校教育和大众文化产品对工人阶级产生的影响,无法直接从产品的内容来推断其效果。霍加特认为,如果要理解其所带来的一切深层的“社会效果”,批评家及教育工作者必须深入已经得到一般化阐释的社会文化世界,并积极地与工人阶级进行探讨。^[41] 在此意义上,阅读尤其是对新兴的大众文化

产品的阅读就是一种文化实践,这就是霍加特所提倡的新的教育模式以及“批判素养”教育思想。

霍加特认为,对于文学批评家和教育工作者而言,要得出关于“新的文化形式可能带来什么影响”的结论,需要更详细地考察“人们将那些东西理解成什么”这一问题。^[42]“我们必须努力认清所有习惯背后的潜在观念,以及那些陈述背后的真实意图。很多时候,真实意图往往与表面呈现出来的内容相反。我们需要在日常用语和风俗仪式的背后探寻和发现其中所蕴藏的不同情感压力。……此外,我们还要审视大众出版物是如何与人们的普遍看法发生联系的——这些出版物怎样改变民众的态度,又遭遇到了民众的哪些抵制。”^[43]这一思想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即社会意识形态在实际中是如何起作用的。无论是系统组织的学校教育还是具有组织性的商业化大众文化,它们都不能被简单地强加于工人阶级受众。即使它们接近于工人阶级文化的习惯、态度以及未曾言说的假设,工人阶级文化自身也有可能从内部改变并中断、隔离它们,并将其纳入新的情感、习惯和判断模式。霍加特本人对这一前景也是乐观的,在他看来,尽管“在最近几十年,各种旨在娱乐的消费物质已经大幅增加”,但“城市工人阶级民众仍然可以对其环境的挑战作出积极的回应,并对廉价的大规模生产有益的潜在价值作出积极的回应”。^[44]

工人阶级在面对大量涌入的大众文化时,为什么不仅没有被这股洪流裹挟而去,而且还能够作出积极的回应?这正是因为工人阶级对教育和媒体信息的接收是非常有选择性的,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对这些媒介所采取的是一种“间接关注”(attention oblique)的态度,“这种关注呈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谨慎态度,甚至是对所有非出自他们所归属的大众阶级的一切事物持有怀疑的态度:‘应当学会取舍’,尤其不能混淆‘严肃’生活和没有结果的消遣”^[45]。霍加特相信,随着工人阶级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工人阶级内部文化传统的强大延续性,他们能够有效抵制学校教育和商业化的流行文化所裹挟的意识形态阴谋及道德缺陷。^[46]在这一点上,霍加特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对抗”观念,和经典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霍加特的文化观念体现了工人阶级文化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坚持了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和有机整体性。^[47]肯定工人阶级文化,强调工人阶级的能动性,这些既是霍加特的独特标识,也是他对文化研究的独特贡献。他的研究表明了政治斗争与文化斗争之间的相互纠缠,赋予

了文化回归阶级政治的合法性。^[48]

3.教育作为底层文化的实践形式

随着文化内涵的扩大,文化不仅指文学艺术,还包括了教育过程、阶级出身、家庭、工作、性别关系等,这些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霍加特的文化概念为工人阶级教育打开了新的文化空间,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形式,其意义进一步凸显。霍加特认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并不是为工人阶级的工作作准备,而是帮助他们提高批判素养。正是对培养工人阶级普遍的批判素养的追求以及对教育的社会政治意义的强调,使霍加特试图突破正规教育体系的束缚,成为英国成人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作为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霍加特认为,对于成人教育而言,文学课程的作用除了发展工人学生的读写能力等基本文化素养,为他们接受专业技能培训奠定基础之外,更要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兼顾成人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接受心理及其内在复杂微妙的感知力,将文学批评与他们的现实境遇勾连起来。^[49]

霍加特敏锐地意识到了二战后流行文化对成年工人阶级学生的影响。在他看来,成人学生之所以来学习文学,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以一种深刻的方式去言说他们自己的状况。因此,在这样的教学中,教师必须卸下文学专家的“盔甲”,而与成人学生平等对话,共同探讨当代大众文化。这样,文学教学的实践就突破了原有文学教育的范围。正是在尝试解答成人学生关于文学与日常生活之间关系的疑问这一过程中,当代大众文化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议题被霍加特纳入学术研究的对象范围。传统的以高雅文学艺术为主的课堂教学内容已经无法满足成人学生的需求,霍加特转而开始实行一种将历史、政治、美学与大众趣味关联起来的模式,即“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50]的路径。

在《文化与国家》(Culture and the State)一文中,霍加特明确地指出了识字能力(literacy)的四层含义:其一,就基本的字面意思来说,它指的是“公民能够阅读”,这也是扫盲工作的一部分。其二,就其功能性层面来说,它比识字更高一层,指的是能应对较复杂的社会生活,比如会对照公交车的时刻表,能够阅读药瓶上的用药说明等,但它所导致的另一种后果是“识字就更容易被文字所欺骗”。其三,比功能性含义又前进一步的是“职业素养”(vocational literacy),具有这种文化的人能够熟练地操作电气或通信等现代设备,但此时,这种识字能力已经跟书籍、阅读、想象力、文学等越来越远。其四,上述三种

文化阶段虽然很受民众喜爱,但仍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霍加特说:“现代社会充满了愚蠢的诱惑,它总是诱导我们过一种没有深度和内涵的群体生活。如果要应对这种状况,我们就必须具有批判性素养,这是一种能够分析和抵制周遭无意义事物的能力。这本应该是各类学校、学院以及大学的中心任务。……但在英国,尤其是在右翼政府看来,它们是很难接受这一方案的。在他们看来,批判性素养是左翼教条主义灌输的代名词。而其实,批判性素养只不过是培养一种通往富有想象力的品质的一扇窗口而已。……如果这些条件已经具备,那么我们就能够实现一种活生生的文化,一种能与他及他自身的遗产紧密相连的文化。”^[51]可见,识字能力是如此重要,因为它“远不只是将书面文字翻译成口头语言,它更意味着人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和扩张,意味着拥有了智识理解(intelligent understanding)及集体思考和判断的基础,而这些,是一个民主制度的根本特征”。^[52]霍加特认为,要在识字阅读中去培养工人学生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素养,意味着“教会他们[工人阶级]在通向民主的公共社会中认识到生活会面临的困难、挑战和利益所得。这就意味着要揭露那些日益堕落的腐败,揭穿谎言和那些自以为是的说服者”。^[53]这种素养既是获得个人发展的途径,又是对自身生存状态和社会不公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武器。因此,霍加特的研究试图转变社会对“受过教育的人”之标准的界定,拓展工人阶级教育的空间,改变既有教育模式。他以“奖学金男孩”的亲身实践,采用新的方式教育和启迪工人学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使得教育成为工人阶级群体向上流动的“底层文化资本”。

四、讨论:“奖学金男孩”对底层文化资本理论的一种补充

近年来,针对“寒门贵子”问题,国内教育界有学者尝试提出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来进行解释。他们将目光聚焦于“读书的料”这类来自底层家庭并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学子,通过自传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注意力转向底层子弟实现阶层突破进程中的文化生产,认为这类“寒门贵子”实现阶层旅行的关键在于他们拥有某种形式的底层文化资本,即先赋性的学习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54]底层文化资本理论试图突破布迪厄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也试图超越同样具有悲观主义

色彩的威利斯(P. Willis)关于工人阶级子弟“子承父业”的文化生产理论,更加关注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及底层家庭自身文化实践及其创生的文化资本,从而对长久以来的文化资本理论进行了拓展。

1. “奖学金男孩”与“读书的料”:两种底层文化资本的共通和差异之处

霍加特笔下的“奖学金男孩”同中国本土底层文化资本理论中研究的“读书的料”,是“寒门出贵子”的两种典型代表。他们都出生于社会底层,通过正规教育取得高学业成就,最终实现阶层旅行。在这一过程中,“奖学金男孩”和“读书的料”都遭遇了文化失衡,出现了阶级(阶层)身份认同的危机。霍加特和底层文化资本理论的提出者,都意识到了这种境遇对“寒门贵子”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性,他们都从文化、教育与阶层突破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两类研究在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上有很多的相似性,但所暗含的价值逻辑却十分不同。

在理论取向上,“奖学金男孩”研究与底层文化资本理论都反对将文化资本视为中上阶层的专属品。他们都认可经济贫困并不意味着文化贫困,社会行动者不仅受制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结构,也在进行着自身的文化生产。就此而言,霍加特虽然没有对文化进行明确的理论化定义,但是他的文化概念却在他的继承者威利斯的定义中得到了清晰的阐述:“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中创造意义的各种实践,而不能被简化为对其他事物的反应,如个体心理、话语或经济。”^[55]并且这一概念得到了底层文化资本理论学者的认可和沿用。他们的研究都突破了文化再生产理论精英式、静态的文化资本概念,成功定义了底层文化,凸显了底层子弟的文化主体性和能动性,走出了底层“文化缺陷论”的泥沼。

在研究方法上,“奖学金男孩”研究与底层文化资本理论都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霍加特率先把F·R·利维斯的文学批评方法运用于大众文化分析,尤其是对工人阶级文化变化原因的分析,并借鉴了Q·D·利维斯(Q. D. Leavis)所使用的民族志,将二者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式。^[56]霍加特的写作所使用的材料,并非一个带有目的性和理论背景的学者通过长期观察、体验而得到的田野调查材料,而更多的是使用个人回忆和一些辅助性材料,以此构建起对于个体经验的探讨。这种研究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研究领域中以“自我民族志”(self-ethnography)的面目出现。^[57]这种方式,在描述“奖学金男孩”文化失衡的情感体验、对英国正规教育的感受方面,提供了一种

真实感。^[58]而在“读书的料”的研究中,研究者大量运用了底层农家子弟的自传,作为研究的材料。二者都重视这种“生命的书写”,将个体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将个人与文化相联系,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更加凸显作为行动基础的个人意义与社会意义。^[59-60]

在价值逻辑上,“奖学金男孩”和“读书的料”最终都通过教育和个体的文化生产成功实现了阶层突破。但不同的是,底层文化资本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底层子弟如何在具体情境中将在正规学校教育中遭遇的“文化失衡”建构成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本,进行自身的文化生产,从而实现对原生文化的反叛这一过程,反叛的成功即是研究的终点。而霍加特的“奖学金男孩”研究,则侧重以“文化失衡”作为“奖学金男孩”回归阶级的起点,其终点不是“奖学金男孩”接受高等教育后对原生阶级的反叛,而是“奖学金男孩”通过新的文化和教育实践形式重新回归阶级。因此,霍加特的“奖学金男孩”研究和底层文化资本理论呈现的是教育的个体逻辑和群体逻辑之别。

2.超越“读书的料”:“奖学金男孩”之于阶级解放的意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霍加特“奖学金男孩”研究的意义。与“读书的料”遥相呼应,霍加特笔下的“奖学金男孩”也是通过教育成功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寒门贵子”。“读书的料”以自己的文化生产艰难地走出了社会再生产的诅咒,但却成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地位群体”,其文化世界面临着诸多风险,而且不再与原有阶层共命运。“奖学金男孩”同样遭遇深刻的文化失衡,失去阶级归属感。但霍加特的研究清晰地呈现了一条将个体与阶层群体的命运连接起来的线索,他试图拓展文化的内涵,改变衡量个体文化素养的标准,改变既有的教育模式,通过新的文化和教育实践将“奖学金男孩”培养成具有阶级使命的“热忱的少数人”,并进一步通过他们的启迪和教育,培养工人阶级子弟的“批判素养”,从而改变既有的社会阶层和文化秩序。

与底层文化资本理论宏大的理论建构目标不同,霍加特不曾清晰地定义“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甚至都不曾对文化作出明确的理论化定义。但他的文化概念明确地超出了“高雅文化”的范围,将底层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纳入其中,这与底层文化资本有共通之处,而且成为打破既存文化秩序、转变教育标准的一个起点。“底层文化资本”理论以“读书的料”成功实现原生文化的反叛为研究的终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一研究相对忽视了大多数阶层旅行

失败者的经历,并在无形中认可了既有教育现实潜藏的不平等因素,以及主导文化秩序和社会阶层秩序的合法性,而且有浪漫化农家子弟心理品质之嫌。^[61-62]与之不一样的是,霍加特清晰地意识到既有教育体系、模式及评价标准等对底层子弟的不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奖学金男孩”失去阶级归属的重要推手。同时,霍加特也敏锐地意识到这部分“寒门贵子”对于其阶级群体实现社会流动的意义。将“奖学金男孩”培养成具有阶级责任的“热忱的少数人”,并通过“大众文化研究”这种教育实践去启迪更多的社会大众,培养普通人的批判素养,又成了霍加特赋予教育的使命。霍加特关注到英国正规教育如何促使“奖学金男孩”脱离阶级,同时又看到了再次通过教育使其回归阶级的可能性,这是对既有社会阶层和文化秩序的反抗,也是对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公平的希冀。与底层文化资本理论相较,霍加特的“奖学金男孩”研究保持着同样乐观的态度,却提供了更具实践可能性的方案。

五、结语

综上所述,霍加特以亲历者的身份考察了一种英国的“寒门出贵子”的现象。在理论视角方面,霍加特从文化视角来考察“奖学金男孩”的教育历程,并将文化的含义由以文学艺术为代表的高雅文化转变为与日常生活几乎同义的文化。以此为基点,他着重探讨了如何在新的文化时代改造既有学校教育模式,拓展教育的范围,重新定位教育的目标,变革教育标准,从而培养有阶级使命感的“热忱的少数人”,并进一步唤醒和教育大众。霍加特的“奖学金男孩”研究关注教育的文化视角,排斥视教育为中介的技艺之观点。他通过定义底层文化,并凸显底层文化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将教育视为底层文化的一种实践形式,从而赋予了文化与教育回归阶级政治的合法性。在研究方法方面,霍加特注重以个体经历作为社会观察的依据,从而开创了自我民族志研究方法,并将其与文本细读的方法相结合,展开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形成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路径。在价值逻辑方面,霍加特通过拓展文化的内涵,扩大了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空间,并将当时英国对教育标准的关注,从学校或大学的立场转向了直接针对全体成人的一般文化标准的立场,有利于促进教育的民主化。霍加特的“奖学金男孩”研究与国内关于“寒门贵子”研究的“底层文化资本”理论,在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方面有呼应之处,但二者体

现了教育的个体逻辑和群体逻辑之别,因而,霍加特的“奖学金男孩”研究能够作为底层文化资本理论的一种补充,为国内的“寒门贵子”教育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正如法国学者德莱(C.Delay)所言:“霍加特的影响不仅超越了英语世界,而且超越了霍加特所处的年代。如今还有许多社会学家相继运用霍加特的理论,抛开地域的限制,研究工人阶级和普通人的价值观。”^[63]

注释:

- ① 这一类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蒙冰峰著《“寒门难出贵子”现象、原因与破解》,载于《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12期,第64—69页;黄敬宝著《寒门能否出贵子——基于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作用的分析》,载于《青年研究》2015年第5期,第1—10页;郭书剑、王建华著《寒门贵子:高等教育中精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冲突》,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第10期,第21—36页;谢爱磊等著《“寒门贵子”:文化资本匮乏与精英场域适应——基于“985”高校农村籍大学生的追踪研究》,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4期,第45—64页;范先佐著《“寒门难出贵子”的原因及解决之道》,载于《全球教育展望》2020年第3期,第36—41页。
- ② 这一类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董永贵著《突破阶层束缚——10位80后农家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质性研究》,载于《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3期,第72—76页;程猛、康永久著《“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载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第83—91页;曾东霞著《“斗室星空”:农村贫困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经验研究》,载于《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第38—43页;余秀兰、韩燕著《寒门如何出“贵子”——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阶层突破》,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第2期,第8—16页;董海军著《从放牛娃到教授——崛起于畎亩的寒门子弟对底层成长的分析思考》,载于《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第24—29页;董永贵著《“信”与“从”:底层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秘钥》,载于《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期,第104—110页。
- ③ 霍加特所著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一书有两个中译本,分别是李冠杰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和阎嘉译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另外,该书第十章第一节“奖学金男孩”的中译文,此前已收录于陶东风和周宪主编的《文化研究(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中。本文有关霍加特的相关引文,参考和对照了上述译本,但均根据英文原文进行了核对或改译。
- ④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阅霍尔(S.Hall)的《无阶级的观念》和塞缪尔(R.Samuel)的《阶级与无阶级》两篇文章。参见张亮、熊婴编《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

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153—170、171—188页。

- ⑤ 《巴特勒法案》规定:“法定公共教育体系由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组成”;地方教育当局的职责包括“为公立学校学生提供生活补助费,为接受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罗宾斯报告》则强调英国高等教育“如何为社会服务”这一重大问题。参见刘丽平编著《简明教育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82页;吴式颖主编《外国教育史教程》(第3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423—424页。
- ⑥ 《识字的用途》第十章的标题即是关于奖学金男孩“无根可寻和焦虑的说明”(A Note on the Uprooted and Anxious)。
- ⑦ 霍加特引用了斯宾塞的话,认为当前的这种教育制度,“无论它向学生教授的内容是什么,其形式在根本上来讲就是坏的(vicious)。因为它们鼓励的是一种服从性的接受,而不是独立自主的活动”。参见Herbert Spencer,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Watts & Co., 1926, 338;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 Class Life,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7, 243.

参考文献:

- [1][2] HOGGART R. A Measured Life: The Times and Places of an Orphaned Intellectual[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147, 173-179.
- [3][5][6][7][8][10][12][18][19][20][21][22][23][25][43][44] HOGGART R.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 Class Life[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7: 240, 240-243, 243, 243, 244, 247, 246, 293, 260, 275, 263, 275, 265, 275-279, 17-19, 269-270.
- [4][13] HOGGART R. An English Temper: Essays on Educatio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82: 16-17, 45.
- [9] 克里斯·戈尔迪. 抵制与说服: 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识字的用途》中的少数知识分子[M]. 贺秀明, 译//金惠敏. 差异(第7辑).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 110.
- [11] 李曦. 理查德·霍加特的阶级身份认同危机及其化解与升华[J]. 理论导刊, 2018, (3): 63-69.
- [14] HOGGART R. The Tyranny of Relativism: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Society[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35-36, 31.
- [15] 周丹. 英国成人教育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6): 275.
- [16] 周丹. “奖学金男孩”与文化的用途——理查德·霍加特的“批评素养”教育观[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8,

- (2):299-309.
- [17] 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M]. 吴松江, 张文定,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409-410.
- [24] 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26.
- [26] 付德根, 王杰. 20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17.
- [27][42] HOGGART R. A Sort of Clowning[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0: 62, 135.
- [28] 韩昀. 论霍加特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及其意义[J]. 外国文学, 2017, (6): 137-147.
- [29] TURNER G. Critical Literacy, Cultural Literac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Curriculum in Australia[M]//OWEN S. Richard Hoggart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24.
- [30][53] HOGGART R. Between Two Worlds[M]. London: Aurum Press, 2001: 195, 196.
- [31][57] 陈启明. “生活”与“批评”的用途——《文化的用途》的阐释和方法论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2013: 9, 21.
- [32] 伏珊, 邹威华. 理查德·霍加特与“批评素养”文化政治[J]. 四川戏剧, 2015, (8): 41-43.
- [33] 尼古拉斯·加恩海姆. 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M]. 贺玉高, 译//陶东风. 文化研究精粹读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05-206.
- [34][58] TURNER G.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03: 38, 38.
- [35][41][47] HALL S.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nd the Cultural Turn[M]//OWEN S. Richard Hoggart and Cultural Studies. Houndmills: Palgrave, 2008: 24, 24, 24.
- [36] JOHNSON R.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M]//STOREY J.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London: Arnold, 1996: 86.
- [37] 麦克·柏雷. 理查德·霍加特对文化研究的用途[M]. 贾海波, 陈丽佳, 王凯娜, 译//金惠敏. 差异(第7辑).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 105-106.
- [38] 丹尼斯·德沃金. 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M]. 李凤丹,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117.
- [39] CHUN L. The British New Left[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35.
- [40] 皮埃尔·布尔迪厄, J.-C. 帕斯隆. 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 邢克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8.
- [45] 丹尼斯·库什. 社会科学中的文化[M]. 张金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16.
- [46][49] 邹赞. 文化的显影: 英国文化主义研究[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188, 175.
- [48] LEE R E. Life and Times of Cultural Studies: The Politic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8.
- [50] 理查德·霍加特. 当代文化研究: 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M]//周宪, 罗书恒, 戴耘. 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38-44.
- [51] HOGGART R. Culture and the State[J]. Culture and Society, 1999, 37(1): 94-98.
- [52] BAGLEY W C. An Essentialist's Platform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merican Education[J].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 1938, 24(4): 241-256.
- [54] 程猛. “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12-149.
- [55] 保罗·威利斯. 学做工: 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 秘舒, 凌旻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中文版序言)2.
- [56] 徐德林. 重返伯明翰: 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17.
- [59] 蒋逸民. 自我民族志: 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J]. 浙江社会科学, 2011, (4): 11-18.
- [60] 鲍磊. 社会学的传记取向: 当代社会学进展的一种维度[J]. 社会, 2014, 34(5): 174-205.
- [61] 杜亮, 刘宇. “底层文化资本”是否可行——关于学校教育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流动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 (5): 36-42.
- [62] 汪卫平, 袁晶. 向上流动的心理代价: 农村大学生的情感体验研究[J]. 重庆高教研究, 2020, 8(3): 25-37.
- [63] 克里斯托弗·德莱. 再议瑞士工人阶级文化: 霍加特式社会学的贡献和局限[M]. 王磊, 薛倩, 译//金惠敏. 差异(第7辑).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 140.

(本文责任编辑 童志勇)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Monthly)

Vol.43, No.7 Jul., 2022

- The Individual Quality and Environment behind the Phenomenon
of Scientific Creativity YAN Guang-cai(1)
- The Principle of the Element Change of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 SHI Qiu-heng, JI Wen-xi(14)
- From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to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 Epoch Theme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ZHOU Chuan(22)
-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Binding Force LU Xiao-zhong(29)
- The Appeal, Predicament and Path of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rollment Mode
in the Popularization Stage LUO Li-zhu(40)
- Decision Support: A Neglected Field in University Management LIU Xian-jun(48)
- Three Mechanisms of Decision Suppor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China
..... WEI Shu-guang(54)
- Research on the Data-based Decision-making Support Model
in Universities LI Jin, CHEN Min, ZHAO Zhong-yu(59)
- The Collaborative Matrix: Institutional Research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Decision Support in Universities ZHANG Jun-chao, HAN Bao-cheng(64)
- The Definition and Typ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ory SHEN Wen-qin(69)
- Reconsidering the Value of Doctoral Education
——Inspection o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Doctorate Holders from Agricultural-related Disciplines
..... LUO Ying-zi, ZHANG Jia-le, GU Jian-xiu, CHEN Er-dong(89)
- Rethinking “the Elites with Poor and Humble Families” in England:
A Study Center on Richard Hoggart's “Scholarship Boys” LI Li(99)

欢迎订阅 高等教育研究

探索高等教育规律 荟萃高教研究精华

——更敏捷的学术载体

——更广泛的作者群体

——更厚重的理论容量

——更高远的目标追求



扫码订阅《高等教育研究》

• 报刊在线订阅网址 BK.11185.cn

• 客户订阅电话 11185

• 全国邮政营业网点

• 合作服务电话 010-68859199

高等教育研究 (月刊)

2022年第7期(总第329期)

2022年7月1日出版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ISSN 1000-4203



编辑出版 《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

主 编 许晓东

地 址 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电 话 027-87543893

邮政编码 430074

印 刷 武汉珞南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 武汉市邮局

邮发代号 38-73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782信箱)

国外代号 NTZ1041

刊 号 ISSN1000-4203
CN42-1024/G4

国内定价 20.00元